

没有希望的子弹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罗小茗

姜文毫不吝啬他的子弹，回报也同样斐然。电影上映五天，票房突破 2 亿。在被冯小刚们糊弄了许久之后，人们终于等到了一次真正的激动，通过对电影中草蛇灰线的积极解读，陶醉在对“革命者”的想象之中。这一让人激动的想象，在现实中具有双重的效果。一则让姜文“站着把钱挣了”，二则似乎正在实现另一句经典台词的承诺，人们纷纷预言，这个充满政治性的电影本身，就是姜文在和今天的黄四郎们玩一个“让子弹飞一会儿”的游戏。

一时间，姜文和张麻子被混为一谈，他们的形象和寓意在人们的议论中高度重叠。姜文就是张麻子，张麻子就是姜文。张麻子是谁？他是一个早年追随蔡锷将军的革命者，他不愿意跪着挣钱，也不让别人下跪，他要当老天爷，他要办黄四郎，他告诉我们，没有黄四郎的世界对我们很重要……。姜文是谁？他企图示范人们如何站着挣钱，他在一个充斥了商业大烂片的时代拍出了一部讲政治的电影，他试图在如今“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的世界里重新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他替我们想象性地办了“黄四郎”，又让我们迅速沉浸在对“革命第二天”的清醒之中……。

姜文和张麻子的高度重合，既是姜文的心愿，也是人们的希望。毕竟，这个时代是多么的缺乏英雄人物，任何貌似英雄式的个人，都会受到不予分辨的热情拥戴。甚至于有评论如此慷慨解读：张麻子把一支枪对着自己，一支枪指着花姐，那是因为“最纯粹的革命者一定是那个一支枪对着自己，一支枪对着敌人，在心里装着最美好理想的人。”然而，也就是在这里，革命者和伪革命者之间，英雄和貌似英雄的人物之间，显现出他们的差别。毕竟，检验革命者是否纯粹的标准，从来不是他自己拗出来的某个造型，而是在于他对这世界上统治者和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他和世界的关系。

毫不意外的，姜文对于大多数人、统治阶级乃至世界的看法，也和张麻子出奇的一致。

鹅城的统治者是谁？黄四郎。电影对它的刻画，能够通过审查，实在颇让人意外。黄四郎不满于任何反对他的势力，也没有拉拢鹅城两大家族的政治头脑，只想通过各种途径从他们身上榨出银子来，以便将鹅城的经济政治的权力彻底集中在自己手中。在与张麻子对垒的过程中，黄四郎愤怒的仅仅是“他们居然敢猎杀我的马”这一类强弩之末的问题。临到末了，才想到他有更大的软肋，他的替身。缺乏政治智慧的统治者，只有本末倒置的经济本能，这和今天的情况，何其类似。单就这一点而言，姜文对统治者的把握，的确出色。而更为出彩的，则是其对替身的理解和运用。也许在任何时代，统治阶级都需要它的替身，既代替它接受人们的诅咒，也代替它接受人们的毁灭；革命者的意义，有一部分便在于指出，使用替身的风险，恰恰在于替身的“被砍头”，也就意味着真身的灰飞烟灭。黄四郎和他的替身之间“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循环，看起来更像是张麻子式的革命者对今天的黄四郎们和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替身的一次聪明的警告。

然而，对鹅城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砍杀黄四郎和他的替身，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要

在电影中思考这一点，着实不易。电影镜头中的他们，永远是一个又一个扛着箱子椅子飞奔而去的背影。尽管从来没有孤零零的革命者，革命者的诞生势必与他和社會中的绝大多数人的新关系的出现联系在一起，不过，从黄四郎和张麻子的对峙开始，电影对于这“绝大多数人”的描述，便充满了鄙夷之情。群众是谁？是张麻子大叫大嚷不让他们下跪，却依旧下跪的人。群众是谁？是那些在窗口被扔进了银子后以笑声回报的人。群众是谁？是张麻子和黄四郎眼中敢怒不敢言的审时度势的“背叛”者，是谁赢了就跟谁跑的人。群众是谁？是造反胜利之后，坐享其成的人，毫不掩饰地说，“县长，让一让，这椅子现在归我了”。而从这样的绝大多数人中诞生的公务员，比如“武举人”之类，他们的“咸于革命”，对我们来说又是多么的熟悉啊。在这里，绝大多数人被视为一种盲目而恐怖的力量，他们有践踏一切的蛮力，却被剥夺了觉悟的可能。他们的命运永远是被聪明人拿捏或诱导，被排定去分享聪明人的野心或理想。

在这样的鄙夷中，革命的第二天势必到来，过去的革命者势必重新坐上火车，吃着火锅唱着歌，驶向上海。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对绝大多数人的鄙夷与不信任，正是革命的第二天才会有也才动人的情绪。可惜的是，这样的情绪无助于解决真正的问题——没有了黄四郎，谁有真正的强力规划出新的布局，让人们彻底摆脱受人拿捏或诱惑的命运？而我们今天的处境，也早就不是什么革命的第二天，而是革命的第N天。在革命的第N天里，如何重新定位和想象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的位置，这恐怕是今天重新开启革命的唯一入口。

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让子弹飞》是一部重要的电影。正是它所包含的这种对革命的描述和所引起的人们对革命的反应，勾勒出了这个时代的基本情绪：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压迫和不满，人们却依然裹足不前，不愿意重新想象和理解自身。张麻子之所以成为英雄，或被奉为“革命者”，很大程度上在于他赤裸裸地印证了所有人们对于今天统治阶级的判断，也毫不犹豫地确认了人们对绝大多数人的看法。于是，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愿意成为张麻子，通过把别人想象成为面目不清的大多数，把历史想象为革命与反动的轮回，来把自己确认为唯一醒着的英雄。

而当貌似左倾的小知识分子和愤青们慷慨激昂地赞美这样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更为严峻的形势。那就是，一边是英雄的匮乏，而另一边却是英雄的标准的迅速降低；一边是革命激情的重燃，而另一边却是对革命的理解力的迅速退化。当姜文那孤芳自赏的英雄主义唤起人们对革命的无限快感的时候，这终不过是一桌犬儒主义者的宴席。革命成为没有理想的只为改变现状的暴力运动，而对革命的梦想则成为躲在城市生活中发泄现实的情绪却不改变任何自我认识的消食运动。

于是，姜文最终射向我们的，是一颗彩色的弹子糖，它让我们在有任何实际的对抗的思考之前便已经感受过了反抗的甜蜜和无奈。在今天普遍的犬儒的生活状态和憧憬中的革命姿势之间，它从来没有创造出任何的空隙，让子弹真的飞上那么一会儿。

2010-12-22

（本文刊发于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2013）